

收稿日期:2026-01-20

网络“圈层化”背景下 抗战记忆建构的困境与出路

周江平,罗静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0)

摘要:网络“圈层化”是当今时代网络生存和社交的主要样态,为新时代开展抗战记忆建构工作提出了新的可能性。同时它也给抗战记忆建构带来了挑战:圈层壁垒高筑容易导致抗战记忆建构的缺位;圈内唯趣是图容易引发抗战记忆建构的偏差;圈层认知差异容易消弭抗战记忆建构的共鸣。冲破圈层困境,引导社会群体保持、重温、强化抗战记忆,有助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持续释放精神动能。为此,要立足于网络“圈层化”实际,寻找抗战记忆建构“破壁出圈”的出路:多形式打破圈外屏障,弥补抗战记忆建构的缺位;多措施引导圈内思想,纠正抗战记忆建构的偏差;多维度弥合圈层对立,激发抗战记忆建构的共鸣。

关键词:网络“圈层化”;抗战记忆;网络生存

中图分类号:D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3-0011-08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的群体特征及培育路径研究”(ND248844)。

作者简介:周江平(1979—),男,湖南邵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罗静(2001—),女,湖南郴州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sxb.1003-6873.2026.03.00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1]抗战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篇章,是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抗战记忆的建构,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并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有助于更加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新时代持续推进抗战记忆的建构,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而不可替代的意义。然而,随着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也随之发生变化。当前,网络“圈层化”已经成为人们网络生存和社交的主要趋势。虽然“圈层化”为人们提供了以“圈”群分、以“趣”类聚的条件,但也造就了“圈地自困”的局面,使抗战记忆等面临前所未有的被解构危机。因此,有必要对网络“圈层化”下抗战记忆建构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深度剖析其在网络“圈层化”中遇到的种种困境,进而提出相应且有效的对策,这对在

媒介迭代中守护抗战记忆的完整性与精神传承的延续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人以圈居:抗战记忆建构的依据

“无论是战时还是当下的个人或团体,其重视抗战记忆传衍的初衷皆是‘复活历史’以镜鉴现实。”^[2]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具有“铭记”与“遗忘”的双重属性。抗战记忆的建构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还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通过建构,抗战记忆可以在集体意识中扎根,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纽带。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交往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网络空间逐渐呈现出“圈层化”特征,这为抗战记忆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语境与可能性。

(一) 抗战记忆及其建构的内涵

抗战记忆作为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集体历史记忆,主要由屈辱记忆和奋斗记忆构成。其中,屈辱记忆是指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一系列暴行,如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等,这些不仅深刻记录了中华民族遭受的深重苦难,更以铁证揭示了侵略者的残暴本质。在正确历史观的引导下,屈辱记忆能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然而,抗战记忆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还有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记忆。这一维度的记忆主要通过重要战役的历史记载和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得以传承和延续。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精神,谱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民族史诗。作为抗战记忆的核心组成部分,奋斗记忆不仅承载着民族精神的精髓,更是后世为实现民族复兴而持续奋斗的精神源泉。

从理论视角来看,抗战记忆是典型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创造性提出“集体记忆”概念,他指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3]40}后来,他又强调:“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社会建构的过程。”^{[3]39}由此可见,建构性是集体记忆的核心特征,是人们从当下现实出发对集体过去进行的诠释与建构、追忆与再现。因此,抗战记忆建构是指建构主体通过多种建构方式(包括物化空间、纪念活动、历史书写、媒介传播等)保持、重温、强化集体对抗战时期各方面记忆的过程,是对中华民族记忆库存的保护过程,也是使抗战记忆在集体互动过程中得以传承和延续的过程。

(二) “圈层化”背景下抗战记忆建构的必要性

当前,网络信息生态错综复杂,正确记忆和错误记忆、片面记忆和完整记忆、真实记忆和杜撰记忆相互交织,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加剧,各种错误思潮不断涌入,这些严重影响了圈层成员的意识形态环境,模糊了抗战记忆的正确性与客观性。因此,加强抗战记忆的建构刻不容缓。

第一,建构抗战记忆有助于遏制圈层成员对抗战历史的集体性遗忘。社会成员会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在互联网中择圈而入,寻找“网络栖息地”。身处特定圈层中,个体容易被长期推送的相似内容蒙蔽,将自己封闭并且疏离外界。“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圈层’变‘围城’,成为信息壁垒。”^[4]这种信息孤岛现象,不仅限制了圈层成员的认知视野,还会削弱个体对抗战历史的认知深度和情感联结强度,从而造成抗战记忆的断层。

第二,建构抗战记忆是消解抗战历史“泛娱乐化”的重要举措。众人选择筑圈而居的本质是为了寻求一个能纾解压力、愉悦身心的娱乐场域,“但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娱乐突破自身界限,迅速扩张到了经济、政治、教育等多个领域,演变为了影响社会生活、塑造政治伦理的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手段”^[5]。过度的娱乐容易冲破历史真实的底线,将历史拉入“泛娱乐化”的漩涡,导致抗战记忆成为娱乐消费的对象。

第三,建构抗战记忆是防范历史虚无主义侵蚀的重要屏障。网络圈层的排他性较强,圈层

成员大多数只认同圈内思想,忽视圈外声音,因此圈内思想与圈外主流思想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鸿沟,而这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绝佳环境。当然也给了历史虚无主义乘虚而入的机会,其在圈层内部大肆歪曲抗战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甚至恶意抹黑抗战英雄,容易造成恶劣影响。因此,抗战记忆的建构必须打破圈层壁垒,以真实客观的历史反击历史虚无主义,谨防圈层成员掉入西方政治强权、文化霸权和网络霸权的陷阱。

(三) “圈层化”背景下抗战记忆建构的可能性

在网络“圈层化”背景下,同质吸引、身份叠加和层级分化等特征愈发鲜明,这为抗战记忆的建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第一,同质吸引能激发抗战记忆建构的情感动力。同一圈层成员由于高度相似的兴趣爱好、认知模式和价值取向等特质相互吸引而汇聚在一起,他们更容易无话不谈,也能促成圈层其他成员对抗战记忆的情感共鸣。相比于书籍、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介,“数字媒体技术作为自我展演与记忆传布的行动性工具出现”^[6],推动了“人人皆媒”的建构局面。圈层成员的表达意愿和群体活跃度大幅提升,抗战记忆的建构也因此获得强化,极大增强了圈层内个体进行抗战记忆建构的热忱。

第二,身份叠加能拓展抗战记忆建构的传播范围。“个体往往利用他人作为尺度,进行自我评价,借以确认自己的属性。”^[7]在网络“圈层化”背景下,个体的身份属性具有多元性和流动性,其往往同时归属于多个圈层,并在不同圈层间进行信息交换与价值共享。这种身份叠加为抗战记忆的建构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个体在某一圈层中接触到的抗战记忆内容,可能通过跨圈层活动传播至其他圈层,从而实现记忆的扩散与再生产。

第三,层级分化能提升抗战记忆建构的组织效能。网络圈层的内部并非无序,而是具有明显的层级分化特征。圈层成员通常呈金字塔式分布,处于顶层的“意见领袖”(KOL)凭借其丰富的网络资源、强大的信息驾驭能力,以及广泛的社会号召力,成为圈层活动的核心组织者。“对于意见领袖(KOL)主导的圈子,圈层中心人物的存在使内部权力关系等级明显且固化。”^[8]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圈层内部可形成分工明确、协作高效的组织模式,从而显著提升抗战记忆建构的组织化程度,使抗战记忆的建构从零散的个体行为转变为系统化的集体实践。

二、 圈地自困:抗战记忆建构的困境

网络平台为增加用户黏度,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会根据使用者的喜好定制推送内容,以实现“双向奔赴”。各网络平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圈层”,并相互交织在一起,构筑起网络空间新型的社交图景。虽然“圈层化”的社交模式深受用户青睐,但圈层外部壁垒高筑的现状、圈层内部唯趣是图的观念和圈层之间认知差异的扩大,给抗战记忆的建构带来了种种挑战。

(一) 圈层壁垒高筑导致抗战记忆建构的缺位

每个圈层外部似乎都矗立着一道无形的墙,深刻影响着圈内与圈外的交流互动,这道墙会使抗战记忆的建构在不同圈层中出现缺位的情况。一方面,算法技术正以一种隐蔽而强大的方式加固着圈层壁垒。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推动下,算法技术通过对用户行为的精准捕捉与分析,精确描绘出用户画像。圈层成员在网络空间中的每一次点赞、评论或转发,都会成为算法优化其信息推送策略的依据,从而使用户日益沉浸在由同质化信息构成的茧房中。这种定制化、标签化内容,虽然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分众化,却也无形中限制了用户接触多样化、异质性信息的可能性。因此,抗战记忆虽然具有深厚历史底蕴与广泛社会价值,却由于缺乏即时的商业利益

驱动,往往难以在平台推荐机制中获得高度曝光,久而久之就会被边缘化,从而在某些圈层中呈现“看不见”的缺位状态。尤其是年轻用户的浏览习惯趋向短、快、轻,当严肃的抗战历史内容无法在短时间内激发其兴趣,就容易被划过,进而彻底错失传播窗口。另一方面,“圈地自萌”的文化理念也进一步强化了圈层壁垒。圈层成员在特定非公众场合内,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或价值观,形成一种自我封闭与保护的机制。它鼓励个体或群体在相对封闭的圈层内,自由地追求并享受小众化的文化体验,同时避免与其他主流观念或异质性群体发生冲突。这一文化现象反映出当代社会成员对个性化、差异化需求的强烈渴望,以及在网络空间寻找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努力。此外,“圈地自萌”还会导致信息系统的高度“内循环”,而抗战历史叙事由于缺乏“圈感”和“话语共识”,容易被排斥在外,进而在某些圈层中形成历史记忆的断层。基于相同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特色圈层,不仅拥有独特的文化符号与加密语言,还存在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这就使严肃的抗战历史话题很难进入其语境之中。在算法技术与文化隔离机制的叠加效应之下,抗战记忆的“入圈”将面临更大阻力,抗战记忆的建构也随之会面临缺位的情况。

(二) 圈内唯趣是图引发抗战记忆建构的偏差

圈内文化往往以兴趣为导向,引导圈层成员关注与自身兴趣相关的内容。这种兴趣至上的思维倾向,不仅会窄化个体的认知视野,而且会弱化其对抗战历史的认知,从而使抗战记忆的建构在不同圈层,甚至不同个体间造成偏差。第一,唯趣是图使内容呈现娱乐化倾向。当前,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圈层成员而言,“在生产生活中追寻时代的发展脉络,进行数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网络音乐、网络文学已成为其获取精神食粮、调节身心健康重要渠道”^[9]。然而,网络空间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极易过度刺激圈层成员的感官需求,使其对“娱乐化”产生片面且错误的解读,严肃的历史叙事易被消解于娱乐的狂欢之中。抗战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教育意义,但在“泛娱乐化”的侵蚀下,抗战记忆的建构开始出现偏差。这使得“个体记忆甚至有关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都可能会与生产和消费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商业环节联系在一起”^[10]。为迎合圈层成员唯趣是图的心理需求,有些内容生产者毫无底线地对抗战历史采用浅薄、猎奇的“显眼包”式叙事,这就背离了抗战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第二,唯趣是图致使记忆解读片面化。这种片面化,一方面基于群体身份偏差,如军事爱好圈普遍更关注战争中的战术、武器装备等军事细节,而文学爱好圈则更倾向于关注抗战时期的文艺作品和流行文化,这两个圈层都可能对抗战历史的大背景和深远意义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源于价值取向偏差,在抗战记忆的建构过程中,部分圈层成员可能更关注抗战故事中的情感纠葛、个人英雄主义等元素,而忽视了抗战记忆所体现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怀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等主流意识形态。第三,“唯趣是图”致使互动交流浅层化。由于过于追求趣味和娱乐,圈层成员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以情感宣泄为主,对抗战历史的讨论往往停留在表面,缺乏对抗战历史事实的深入探讨和分析。

(三) 圈间认知差异消弭抗战记忆建构的共鸣

“集体记忆的唤询和强化本质上是身体经历和思想内化的实践流程。”^[11]抗战记忆的建构既不是机械式的单向传播,也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而是个体在长期接触过程中对抗战记忆形成共鸣并传承的建构过程,因此抗战记忆的成功建构是以个体的共鸣为基础的。适当的情感共鸣具有积极影响,不但能够促进抗战记忆的传承,而且能够激发爱国情感和民族凝聚力。然而,集体记忆并非社会的单一记忆,抗战记忆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表现形式、价值取向与情感认同本就存在差异。在网络“圈层化”语境中,这种差异更表现出多样性,甚至可能引发多个圈层

间的局部性认知冲突。一方面,认知差异会导致不同圈层对抗战记忆的共鸣程度和持续时长不一致。抗战记忆通过历史教育、纪念活动和纪念馆建设等多种建构方式,使个体能不同程度地产生情感共鸣和历史认同。但是由于个体所处的圈层不同,对抗战记忆的共鸣程度也不同。此外,网络存储着大量信息,但是人的注意力和吸收信息能力是有限度的,从而导致信息膨胀与个体的记忆功能产生矛盾,使个体的注意力更加分散。另一方面,认知差异会造成不同圈层表达共鸣的方式不同。不同圈层有截然不同的兴趣取向和价值观念,往往也会以具有圈层特色的方式去建构抗战记忆,当然成效也会有所差异。例如,“二次元圈”倾向将抗战记忆融入二次元文化,注重个人体验和创意表达;主流文化圈偏向通过主流媒体塑造抗战记忆,强调历史权威性和社会意义。“二次元圈”的创意表达难以在主流文化圈引发共鸣,甚至有可能被后者视为缺乏严谨性。可见,在认知差异存在的前提下,很难大范围引发圈层成员对抗战记忆的共鸣。

三、破壁出圈:抗战记忆建构的出路

网络“圈层化”既为抗战记忆的构建开辟了多元路径,但也催生出新的危机。当抗战记忆的公共性遭遇圈层传播的区隔性、严肃性遭遇圈层思想的娱乐性、深刻性遭遇圈层认知的差异性,抗战记忆的代际传承在数字传播中逐渐失去情感共振的纽带。唯有突破圈层藩篱、整肃圈内思想、弥合认知差异,才能在数字化语境中激活抗战记忆的当代生命力。

(一) 多形式打破圈层屏障,弥补抗战记忆建构的缺位

网络“圈层化”进程中形成的亚文化壁垒,本质上是数字时代算法逻辑与群体认同双重作用下的传播异化现象。这种由算法推荐机制强化的“过滤气泡”,不仅导致圈层成员认知的区隔化,更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浸润式传播面临结构性障碍,容易在圈层内部形成正确历史与错误历史并存的窘境,进而造成圈层成员对抗战记忆的错乱或缺失。因此,抗战记忆建构应重构算法技术,破除圈层屏障,让抗战记忆以圈层成员能接受的形式“自然生长”,以实现从缺位到嵌入再到共生的转变。

一方面,善用算法技术,让抗战记忆自然融入不同圈层的“推荐流”。网络平台通过用户画像与兴趣图谱构建“定制化牢笼”,在制造信息茧房的同时,也为精准化传播预留了技术接口。抗战记忆的建构主体,尤其是各大主流媒体,应与商业平台建立“算法协商机制”,在保护用户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将抗战历史的相关内容嵌入推荐算法体系中。同时,主流媒体还应和网络平台共同打造动态平衡的曝光模型,提高抗战历史相关内容在日常生活中的曝光程度,以实现抗战历史的渐进“渗透”,尤其在重大历史纪念日、爱国主义教育宣传节点,应与算法热点机制保持同步,推送契合当下语境的记忆内容。这样既能减少部分圈层成员的抵触情绪,也有助于激活抗战记忆中的“沉睡”记忆、巩固“朦胧”记忆,在日常浏览中悄然形成记忆重塑。

另一方面,优化内容供给,让抗战记忆的叙事方式能为不同圈层接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信息生产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在网络“圈层化”过程中,各个圈层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用于本圈层内的信息传递与交流讨论,而特定圈层的行话术语也成了需破译的“密码”。要突破这种特定圈层话语体系造成的文化区隔,必须做好“翻译”这一关键工作,助力抗战记忆从“国家叙事”到“圈层话语”的双向转译,顺利推进信息生产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确保抗战历史内容准确的情况下,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抗战记忆的叙事方式呈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态势,从而打破圈层成员对抗战记忆内容过于枯燥无味的刻板印象。在选择抗战记忆内容的叙事方式时,建构主体要针对不同的圈层进行因地制宜的二次创作,如可以借鉴动漫叙事、说唱叙事等方式演绎抗战内容。同时,建构主体要贴近圈层成

员生活,把握近期热点叙事方式,通过亚文化符号消解抗战历史教育的距离感,让圈层成员与抗战记忆建构之间形成零距离接触。用圈层成员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正确的抗战历史观,不但更易让圈层成员主动了解抗战历史,还能抢占流量先机,实现由点到面的大范围传播。

(二) 多措施引导圈内思想,纠正抗战记忆建构的偏差

在网络“圈层化”过程中,资本敏锐注意到圈层内部的唯趣是图特征,以极度隐蔽的手段介入其中,进而造成圈层内部出现娱乐失度现象,使“娱乐”异化为逐利工具。一旦各种被裁剪、扭曲和戏谑的失真作品在圈层内广泛流传,必然会导致抗战历史的“泛娱乐化”。“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悄无声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3]要破解唯趣是图困局,必须圈层内外联动发力。

第一,强化主流价值观引领,助力圈层成员树立正确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1]通过“四史”教育系统工程,引导圈层成员树立完整历史观,引导其以崇敬之心对待历史,坚持正确的评判标准,拒绝一切消费历史、娱乐历史和戏谑历史的思想行为,牢牢守住抗战历史的严肃性与真实性。此外,还要培育圈层成员的辩证思维能力,帮助其透过娱乐化表象把握历史本质,筑牢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防线。

第二,重视发挥意见领袖作用。“意见领袖在网络圈层中以积极活跃的表现带动其他成员关注议题、参与讨论,并通过自身的知识、观点和解答影响圈层成员的判断和态度,形塑圈层的内容结构,营造良好氛围。”^[14]一是要与意见领袖群体建立相应的沟通渠道,通过及时沟通,把握意见领袖与网络圈层的舆论动向。二是要加强对意见领袖群体的思想引领和行为指导,把握各个圈层内部意见领袖的思想动态,追踪意见领袖的话语效能,对不当言论及时纠正,推进建设积极正确的舆论生态。三是要将意见领袖群体作为抗战历史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对他们进行定期培训,守护圈层良好生态,破除各种“泛娱乐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现象,确保抗战记忆精准建构。

第三,完善网络空间治理,打造清朗的圈层生态。一是网络平台要加强落实有关互联网的规章制度,对恶意篡改、嫁接、抹黑历史的言论要及时查处。同时要引导圈层成员以合法合理合规的方式发表言论。二是建立动态的舆情监测和评估体系,推进网络内容的加权推荐模型升级。不仅要实时监管网络圈层内部思想舆情情况,还要对圈层内部所传播的信息流量做分类化处理。如通过流量加权提高文献纪录片等严肃历史内容的可见度,重构圈层内部的信息生态,使抗战记忆建构不失真实性。三是网络平台要建立跨平台联合惩戒机制,压实主体治理责任。对屡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的主体应采取“数字身份信用降级”措施,作禁言或封号处理,严防错误扭曲的历史观出现在网络圈层内部,以维护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

(三) 多维度消弭圈间对立,激发抗战记忆建构的共鸣

马克思指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5]这表明,社会是人的存在根基,个人的实践活动全部都在社会中完成。因此,无论个体活跃于哪个网络圈层,归根结底都身处于社会这个“大场域”。即使“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16],但这种差异有着兼容互通之处,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引导圈层融合发展,不但能消弭圈层对立,而且能在更大程度上激发抗战记忆建构的集体共鸣。

一方面,寻找“融圈”的契合点。“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17]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提出的“六度分隔理论”说明,社交网络中的所有节点都是相互连接的,可以通过其中一个节点接触到其他任

意节点,加之网络圈层化中的个体身份本身就具有多元性和流动性特征,所以圈层并非绝对封闭的“孤岛”,而是相对封闭的“群岛”。因此,要在把握各个圈层整体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准确分析各种圈层特有的话语体系、典型特征及互动模式等,捕捉不同圈层相互融合的契合点,消弭圈层之间的“认知鸿沟”,推动多个圈层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拓宽“跨圈”的总渠道。一是要引导圈层成员进行跨圈层的交流,了解其他圈层成员的兴趣爱好和表达方式,建立起多元并存的圈层文化以营造和谐的氛围,使不同圈层成员在表达符合自身圈层价值观念的观点时能尊重、理解、接受其他圈层成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见解。通过这种方式,不但能加深各圈层对彼此的认识,消弭误解,而且可以拓宽圈层成员的个人视野和交往范围,使圈层成员处于不同圈层的边缘或其中,进而打通圈层之间信息交互和深入交往的渠道。二是要呼吁多领域协同发力。单纯靠圈层内部的力量无法推动大面积的“跨圈”行为,“更需要政策的引导和扶持、平台的合作与支持、媒体的宣传和造势、技术的支撑和助力等多方面多领域共同发力”^[18]。尤其是官方媒体,在建构抗战记忆的过程中,既可以邀请知名自媒体博主参与进来,也可以联合其他网络平台共创共建,从而实现不同圈层之间最大范围的同频共振。此外,还应正视抗战记忆在不同圈层间的多重解读与意义追求,在包容多样化历史表达的基础上构建“可对话”的记忆结构。还可通过搭建跨圈层、跨领域的价值协商平台,推动主流叙事与圈层文化之间的相互转译与融合,从而在意义冲突中寻求认同交集,提升抗战记忆的集体共识度与时代感召力。

四、 结语

数字技术的裂变式发展催生了网络“圈层化”,其在重构社会关系的同时,亦使抗战记忆的当代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境遇。一方面,圈层内部的强连接性为抗战记忆的多元表达与代际传递提供了技术赋能;另一方面,“圈层化”导致的信息茧房、娱乐化叙事与价值对立,加剧了抗战记忆的碎片化与共识危机。这种“技术赋权”与“价值撕裂”的张力,揭示了数字时代抗战记忆建构的深层矛盾。针对网络“圈层化”引发的抗战记忆缺位、偏差与对立等问题,既要从技术层面入手,搭建跨圈层传播矩阵,又要从内容层面着眼,优化生产内容机制,以渗透式引导替代单向灌输,实现圈层文化与主流价值的有机融合。作为民族文化的承载者,抗战记忆的建构质量关乎国家认同的根基。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网络“圈层化”引发的抗战记忆解构风险,唯有在承认“圈层化”合理性的基础上寻求对话,并坚持将正确的二战史观贯穿于抗战记忆的建构全过程,才能确保记忆不被异化,历史不被遗忘,民族精神不断延续。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N]. 人民日报,2025-05-08(1).
- [2] 郭辉. 抗战记忆的建构及其价值[J]. 兰州学刊,2020(2):5-16.
- [3]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4] 朱博,朱翠明. 透视青年“圈层化”文化现象[J]. 人民论坛,2023(19):97-99.
- [5] 贝斯特,凯尔纳. 后现代转向[M]. 陈刚,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0.
- [6] 刘于思. 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技术怀旧的文化实践、情感方式与关系进路[J]. 南京社会科学,2018(5):121-127.
- [7] 杨华,赵景阳. 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成因、隐忧与破解[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8):79-81.
- [8] 刘望秀,王歆玫. 党史学习教育如何“破壁”青年圈层文化[J]. 思想教育研究,2021(9):80-85.
- [9] 张雷,曹洪军. 数字青年文化“泛娱乐化”现象:现实症候、生成机理与纠治进路[J]. 理论导刊,2025(3):79-85.

- [10] 王炎. 奥斯威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5-16.
- [11] 程仕波,陈茂演. 集体记忆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4(6):131-137.
- [12]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56.
- [13] 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
- [14] 王谋寅,王耀国. 网络圈层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之策[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2(6):51-58.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8.
- [16] 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42.
- [17] 曹银忠. 大学生网民群体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20.
- [18] 张铨洲. “入世与出世”: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的困与策[J]. 中国青年研究,2022(3):89-94.

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nstructing the Mem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Social Circle Stratification

ZHOU Jiangping, LUO Jing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Hunan, 421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ratification of online social circles has become a prominent pattern of digital existenc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which has ushered in new possibilities for constructing the mem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t also poses tremendous challenges for us: Information cocoons may result in absence of this particular memory; Preference-orientation may give rise to memory bias; Cognitive discrepancy tend to weaken emotional resonance. It is imperative for us to resolve this dilemma, guiding the public to maintain, refresh and consolidate this memory, unleashing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in advanc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proceed from reality, tak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to compensate for memory vacancy; providing ideological guidance to rectify biases; resolving ideological antagonism to arouse emotional resonance.

Key words: online social circle stratification; mem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igital existence

[责任编辑:王建霞]